



指出 1945 年至 1973 年间美国对非殖民化的倡导和以自由贸易取代重商主义,加速了世界非殖民化的进程。<sup>①</sup> 威廉·R. 路易斯、克里斯托弗·索恩以及沃尔特·拉夫伯等学者则指出,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决定着美国反殖民立场及政策的变化。此外,罗伯特·麦克马洪、大卫·瑞安等学者还利用“冷战范式”以及“世界体系范式”的框架,把美国的非殖民化政策放在全球特定背景下来解释,或从美国全球战略和国际体系变迁的视角来解读。他们在研究中倾向于把美国的非殖民化政策描述成根本上的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对各个殖民地发生事件的反应。这些学者在研究中存在的一个很大不足,就是忽视对其深层文化动因和本质的解读剖析。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文化因素被越来越多地引入美国外交史的研究,一些学者开始重视从文化视角来阐释美国的非殖民化政策。大卫·瑞安和维克多·蓬贡主编的《美国与非殖民化:权力与自由》一书,集中了当时美国史学界关于非殖民化问题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其中沃尔特·拉夫伯探讨了美国历史上非殖民化观念的实质;丹尼斯·梅里尔以印度为个案,通过文化视角和后结构主义分析诠释了美国人意识形态中的种族观念,以及关于印度社会的认知对美国非殖民化立场的影响;迈克尔·亨特考察了植根于美国人思想中的种族等级观念和对革命的恐惧对美国非殖民化政策困境的影响。<sup>②</sup> 这些学者虽然是在文化视角下对美国非殖民化政策的根源进行了初步探讨,但他们无疑提出了一种可供借鉴的分析模式,有助于我们阐释美国关于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殖民体系瓦解进程的反应及政策抉择的两难困境。20 世纪,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不仅是主权转移和经济非殖民化的过程。也意味着一种文化非殖民化和民族心理重塑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利用其霸权地位,通过多种途径,以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来实现对第三世界的文化改造使命。显然,作为一种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分析取向,文化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国关于 20 世纪非殖民化问题的基本思考及其设计的政策路线图,有助于我们追溯和解读美国的第三世界政策的起源与实质。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非殖民化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内史学界的重视,尤其是一些从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学者加强了对美国非殖民化政策的探讨,而国外学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本文作者孙建党,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福州 350108]

## 战后德国史学界对纳粹大屠杀罪行的反思

张倩红

以客观性为圭臬的专业化历史学科形成于 19 世纪的德国,德国因此被誉为“现代历史学的摇

① 艾伯特·伯格森、罗纳德·舍恩伯格:《殖民扩张和收缩的长期波动,1415—1969》(Albert Bergesen and Ronald Schoenberg, “Long Waves of Colonial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1415-1969”),艾伯特·伯格森主编:《现代世界体系研究》(Albert Bergesen, ed., *Studies of the Modern World-System*),学术出版有限公司 1980 年版,第 231—277 页。

② 大卫·瑞安、维克多·蓬贡主编:《美国与非殖民化:权力和自由》。



篮”。20世纪以来,接踵而至的两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历史学产生了巨大冲击,围绕如何看待近代以来尤其是当代的德国历史、应该树立怎样的历史意识等问题,德国史学界内部产生了严重分化。但有所不同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史学界普遍沉溺于因战败所带来的民族愤懑情绪之中;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则保持了较为清醒的头脑,主动剖析“刚刚发生的民族之过去”,承认纳粹德国的史学史就是民族主义史观被政治与权力所扭曲的历史,奥斯威辛是历史学家必须背负的“十字架”。由于纳粹大屠杀在战后成了德国战争罪行的代表符号,也成了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精神羁绊,因此,德国(尤其是西德)历史学家以反思大屠杀为切入点,开展直面战争罪责的讨论,建构起健康的历史意识,从而推动了“正常化”、“民主化”诉求在德国的回归,历史学家在重建战后德国历史意识的进程中表现出了浓厚的社会情怀与时代关切。

### 一、“沉默文化”下小心谨慎的大屠杀叙述

二战结束后,传统的德国史学家分成了两大阵营,其中多数学者代表“沉默文化”,主张以禁忌的方式来保全德意志应有的荣誉,对纳粹暴行采取了“心照不宣的沉默”;另一些史学家则开始用“浩劫”、“悲剧”等字眼来解释纳粹时代,认为“罪责问题”已成为“德国人灵魂存亡的问题”,而最早发出这一声音的是历史主义学派泰斗——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1946年,83岁高龄的梅尼克撰写《德国的浩劫》一书,针对国家理性、权力与道德、纳粹主义的出现以及德国历史文化传统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剖析与反思。梅尼克认为,祸害国家与民族的根源并不在于德国的古典文化,而在于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运动的结合以及邪恶的普鲁士主义和军国主义,“群众性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所导致的不道德因素”,使自由传统及人道主义陷入了黑暗的深渊。<sup>①</sup>与《德国的浩劫》几乎同时出版的是著名思想家雅斯贝尔斯的《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一书,聚焦于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责问题,该书开始把希特勒及其同谋视为制造战争的罪魁祸首,从而揭开了战后德国史学家反思纳粹罪行的序幕。<sup>②</sup>

两年后,时任德国历史学家学会主席的格哈德·里特尔(Gerhard Ritter)出版了《欧洲与德国问题》一书,强调普通德国人是纳粹主义的受害者,12年的纳粹时代是德国历史的断裂。他把德国“集权专制”归结于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乌合之众”,认为纳粹主义并非德意志历史传统的产物,而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群氓政治病变的结果,呼吁重塑德国的“历史形象”。<sup>③</sup>显然,无论是梅尼克还是里特尔都极力把纳粹主义解释为一种欧洲现象而非特有的德国现象。总体而言,战后初期传统历史学家对于大屠杀的表述十分谨慎,要么语焉不详,要么竭力回避。这是因为,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无论是欧美社会还是犹太世界,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大屠杀的内疚与沉默”成了普遍的现象。执政的阿登纳政府虽然同意赔偿犹太人,但对大屠杀的态度同样较为消极推诿。在这种“沉默文化”的社会语境下,许多传统派历史学家都把大屠杀归结为纳粹官僚机器的恶行,坚持认为德国民众对大屠杀并不知情,也没有直接的责任,这种历史观得到了很多人的附和。

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一些自由派思想家开始批判这种冷酷的沉默。1959年,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发出了“德国人压制了

① 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著,何兆武译:《德国的浩劫》,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7章。

② 雅斯贝尔斯:《德国人的罪责问题》(Karl Jaspers,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福特汉姆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③ 格哈德·里特尔:《欧洲与德国问题》(Gerhard Ritter, *Europa und die deutsche Frage*),慕尼黑出版社1948年版,第194—195页。

过去,就是在背叛未来”的呼吁。同时,德国社会中依然存在的反犹情绪也极大地唤醒了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他们开始改变传统的历史认知,挑战历史主义学派以民族、国家为主线的叙事模式,批评其过度的政治化倾向与民族价值观将“反民主传统合法化”,主张把欧洲社会科学及行为科学的理念用于历史研究。这些社会史学家与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被冠为“怀疑的一代”、“意见精英”,在他们取得大学教席并主导史学界之后,大屠杀叙述得到了更多的表达空间。

## 二、批判史学家与大屠杀历史的解读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批年轻的历史学家开始重新定位史学的功能,他们不再一味肯定民族的过去,而是对历史过程中的政治结构、民族传统以及社会背景进行批判性分析。其代表人物有汉斯·罗森堡(Hans Rosenberg)、汉斯-乌尔里希·维勒(Hans-Ulrich Wehler)、尤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等,因他们主要来自比勒菲尔德大学而被称为“比勒菲尔德学派”。与老一代相比,年轻史学家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更容易与纳粹主义划清界限。整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历史学呈现出冲突、分化与组合的局面,激烈的争论过后,传统的历史主义学派渐失阵地,新一代历史学家更多地成为历史学界的中坚。他们所倡导的新史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的转向:第一,历史已成为世界历史,“对世界历史的关切使得史学家脱离了对个别文化和国家的关切”<sup>①</sup>,这强化了历史学的当下意识与批判性功能;第二,以历史的、更开阔的视野来看待德国民族国家及其过去,让传统的政治史、民族史等史学传统转向社会史、经济史,抛弃经验史学家的唯心主义传统,建立“历史社会科学”(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他们反对“断裂历史”,认为德国必须改变对过去的认识,而大屠杀正是“过去之认识”的核心,铁血政策与奥斯威辛同样是德国的遗产。

德国新一代历史学家的转向得益于国内政治环境的改变。1963—1965年的奥斯威辛审判以及其他针对纳粹战犯的审判活动使大屠杀的事实越来越公开。1968年,曾经的反法西斯战士勃兰特出任德国联邦总理,两年后他做出感动世界的“勃兰特之跪”以示谢罪,从而使德国政府以其实际行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沉默文化”逐渐被打破,历史学家开始把纳粹主义置于史学研究的中心地位,而大屠杀也成为无法回避的话题。

新历史学家采取社会史的研究路径,从德国的特殊性出发来思考大屠杀发生的原因。他们认为所谓的“德意志特殊道路”,是指近代德国一直沿着一条不同于欧洲以及北美工业民族的特殊发展道路,而地缘环境、军国主义、民族性格、政治制度,尤其是民族主义导致了民主性与现代化的缺失。新一代历史学家认为,这种特殊道路并非民族主义学派所标榜的“德意志的特殊成就”,而是悲剧性的民族遗产,这条畸形的“特殊道路”是“奥斯威辛的种子”、“大屠杀的前史”。

## 三、“历史学家之争”与大屠杀历史的全民认知

在二战结束40年之后,大屠杀的阴影仍盘踞在德国民众的心头挥散不去。一种希望消解罪责感的呼声在德国幡然兴起:难道我们要永远活在希特勒的阴影下吗?德国青年一代难道不能卸下第三帝国的包袱轻盈地步入新的千年吗?德国社会如何才能走出情绪低落的历史,建构新的民族集体认同?在此背景下,一场悄然发生的史学争论在德国社会激起了轩然大波。

1986年6月6日,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题为《过去将不会远去》的文章,认为发生在纳粹集中营里的“种族杀戮”是对斯大林“阶级杀戮”的防卫性反应:“布尔什维克

<sup>①</sup> 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著,彭刚、顾杭译:《德国的历史观》,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341页。

的‘阶级杀戮’在逻辑层面和事实层面岂不是都要高于民族社会主义的‘阶级杀戮’吗?”<sup>①</sup>这种试图消解罪责、实质上为纳粹开脱的行为随即遭到著名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学者哈贝马斯的抨击。他在《时代周报》发表《某种损失的清算》一文,批评诺尔特“替大屠杀勾销罪行”,“让联邦德国在精神上背离西方”,从而引发了左派与右派的大辩论,史称“历史学家之争”。德国史学界的“新保守派”、社会史学派、后现代史学等各种派别都参与其中。双方的阵地分别为《时代周报》与《法兰克福汇报》,争论的焦点包括:大屠杀的独一性或相对性、历史学的公共用途、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罪责意识的承载或消融、大屠杀记忆与德意志民族记忆等,众多学者与主要媒体的卷入,使这一场论战成为二战后联邦德国最为重要的思想论战。

激烈的“历史学家之争”一直延续到1989年,最终以诺尔特为首的“新保守派”的失败而告终,这场论争被称之为“民族意识的自我审判”。经过这场规模空前的思想争论,“大屠杀研究”作为一个专门领域进入了德国历史学的主流,随后出版的一些著述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大屠杀研究;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德国人不再回避历史问题,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健康的历史意识在战后德国的重建。

1989年11月9日,存在了近半个世纪的柏林墙轰然倒塌,两德实现统一。在“我们是一个民族”的号召下,原东德地区经历了一个接纳大屠杀罪责和战后西德新历史意识的过程,大屠杀问题也成为弥合两德冷战裂痕的重要黏合剂。然而在统一后的新德国,大屠杀的阴影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消失而成为过去。“奥斯威辛作为大屠杀的道德灾难和德国罪行的双重代表,依然是一个中心象征、一个隐喻,也是一个知识战场要论证的东西。”<sup>②</sup>1995年发生在德国的关于“国防军罪责”的论争,1996年的“格德哈根争论”,无不围绕纳粹战争罪行而展开,尤其是格德哈根对“普通民众”作为谋杀者的认定,直接拷问着德国民众的人性,从而在德国历史学界引发了众多的讨论。

综上所述,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挑起者与法西斯主义的策源地,战后德国对战争罪责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反省,并赢得了外部世界的积极肯定,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德国历史学界的努力密不可分。战后德国历史学家为什么能够比较深入地反思以大屠杀为标志的纳粹罪行,对其采取不回避和正视的态度,这有着深刻的社会与文化背景。

首先,德国史学界对大屠杀的反思是整个德国知识阶层乃至全社会积极反思战争罪责的一个缩影。德国是一个具有知识分子传统的国家,二战结束后,德国站在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上,知识分子表现出强烈的济世情怀,力图在废墟之上营造理想主义的“精神共同体”。他们相信“在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里,谁注入了记忆、定义了概念、解释了过去,谁就赢得了未来”<sup>③</sup>。德国历史学家一直是知识分子阵营中非常活跃的群体,自历史学科产生以来,无论是洪堡、兰克还是魏玛以来的史学家,都在不同的语境中对历史使命、历史意识进行不同的阐释,不断弘扬史学的批判性传统,强化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

其次,史学反思是后纳粹时代在德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语境的体现。在战后德国,尽管

① 扬·维尔纳·米勒著,马俊、谢青译:《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

② 扬·维尔纳·米勒:《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第353页。

③ 扬·维尔纳·米勒:《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第266页。

纳粹余孽依旧活跃,各种反动意识形态长期留存,但如何回归民主世界、回归正常化、建构新的国民认同成为最主要的诉求,也是民众最根本的期盼。而承载民族文化传统的德国历史学家作为这一社会语境的受益者和推动者,通过对纳粹罪行的深刻反思,促使德国社会承认了悲剧的历史,并积极主动地去修复与曾经遭受纳粹侵略和迫害的战争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对纳粹历史的认识成为检视德国战争反省的试金石,也是国际社会评判德国的度量尺。

最后,对大屠杀的反思也是德国史学传统的延续。战后德国在国民关注的主要问题几乎都充满了分歧与纠结,而历史学由于其特殊的使命与责任一直处于争议的旋涡。自19世纪以来,德国史学界在历史观问题上就一直存在民族国家与启蒙理性之间的冲突。二战后对大屠杀的反思是德国历史传统的延续,反思的实质性与理念性问题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德国的传统史学与来源于欧美的新的历史观念与史学思潮之间的争执、较量和更替;二是德国民族史学传统中过度的民族主义与意识形态化倾向与史学的客观性、科学性之间的矛盾。尽管传统的历史学家与新历史学家们都没能摆脱“有悖于学科科学化”的指责,后者还往往被传统派指责为“滥用大屠杀”、把“灾难记忆工具化”等,但正是在这种批评与争议中,德国历史学走向多元化发展,不同历史学派超越了自身的一个又一个盲点与误区,朝着更科学、更理性的方向发展。

回顾战后德国历史学家反思大屠杀罪行的曲折历程,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迪是:尊重事实,理性包容的民族心态与健康,负责任的历史意识相辅相成;正确的历史态度不仅仅是出于对受害者的关切,对国际社会的责任担当,更是德意志国家实现自我救赎、重建民族认同的必由之路。战后德国人以自己的智慧和行动告知世人:在华沙犹太隔都起义纪念碑前跪下的是一个人,而站起来的却是整个民族;在一次次思想论争中卸下的是沉重的历史包袱,得到的却是仇恨的化解与德意志民族的光明未来。

[本文作者张倩红,郑州大学教授。郑州 450001]

## 日本右翼学者的战争翻案新动向

孙立祥

自1963年林房雄推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以来,日本右翼学者一直在全面系统地侵略战争翻案,试图颠覆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立的业已深入人心的正确历史观。他们不仅抛出了“自卫战争论”、“解放战争论”、“美苏同罪论”、“靖国史观论”、“南京大屠杀虚构论”、“珍珠港事件阴谋论”等种种战争翻案谬论,甚至挑起了一场“卢沟桥的枪声来自何方”的争论。限于篇幅,笔者仅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自卫战争论”略作评介与回应。

1. 关于日俄战争。田中正明说:日俄战争是日本为“维护独立”而“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爆发的”。<sup>①</sup>中村粲宣称:日俄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侵略成性”的俄罗斯不仅对“支那和朝鲜”构成了

孙立祥《日本右翼学者的战争翻案新动向》一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处理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研究”(项目编号:11BDJ002)的阶段成果。

① 田中正明:《虚构的“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委员会编:《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展转社1995年版,第254页。